

'99 中国社会学回顾与展望^①

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 本文尝试对国内一年来社会学专业论文、专著进行分析和比较,并得出归纳性总结。在总结与分析的过程中,既注意把握过去一年中国社会学界所讨论的热点与难点,也注意分析学术前沿和焦点问题。通过分析和总结,进一步强调了进行学术反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社会现实中探索研究对象的本质问题,在知识脉络中推进研究,这样学术才能在不断地反思中得以提炼。

告别了1999年,迎来了中国社会学重建20周年的历史时刻。在这个世纪末的最后一年里,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特点似可概括为:有进展,无波澜,呈比较平稳的推进态势。其“进展”主要表现为:借鉴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如网络分析、生命历程研究;拓展了一些较新的研究领域,如对信任问题和单位组织的研究;同时,在理论、方法论和对策研究方面也都取得了一些进展。所谓“无波澜”,主要是指并没有出现较大的学术争鸣或引起普遍关注的学术讨论,总的态势是稳步地向前推进的。

在迎来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20周年之际,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有必要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方面进行回顾和反思。一个是在理论层面上的“重返古典”,即不断回到基础和经典问题进行思考;另一个则是在注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更为深入的经验研究。这其中主要包括了三方面的含义:其一,填补代际之间的空白,努力做到承上启下;其二,在扎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上,探讨如何沟通理论与经验研究以及方法论的问题;其三,培养跨学科的对话能力。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建设。从目前国内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来看,我们还面临着这样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一,实证性的经验研究与抽象层面的理论研究如何相互沟通、相得益彰;其二,中国社会学如何在面对自己社会的真问题的同时确定自身在学科共同体中的位置,如何在世界学科共同体中寻求发展;其三,如何借鉴不同风格和理论取向的研究成果,形成多样化的学术观点与流派,并建立学术积累的良性机制。总之,“中国社会学界在1999年试图提炼出一些社会学的真问题,不是用西方的理论来剪裁中国社会”(沈原,编辑部编,1999)。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命题、问题意识、规范研究方法、加强理论与实证的结合等将是发展本学科所面临的重大课题。通过精细的经验研究,取得实证资料,从中提炼出有益于解析中国社会的概念,并建构能够反映中国社会实际、指导中国社会研究的基本理论,也将是推动中国社会学学术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内容。

^① 本文统稿人:景天魁、郭于华、罗红光;撰稿人:张志敏、张宛丽、谭深、郑菁、罗红光。此外,本刊编辑部于1999年12月23日召开了在京部分专家学者的座谈会,与会者对本论文的框架及内容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在文字处理上,我们以“编辑部编”的形式取代与会者名单,只在引言处列出发言者姓名,特此说明。

一、学术前沿问题研究

(一)重返古典理论

在《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编辑部报告”中,编者曾对当前中国社会学界所出现的一种浮躁现象提出过批评:“在我们这个诸般新潮理论层出不穷、日渐繁多的时代,时髦话语爆炸式的传播,往往会使人‘见木不见林’,而社会学真正应当面对的问题却往往被淹没了”。“重返古典理论”包含了两个明确的学术目的:其一,就社会学自身而言,要为重建社会学学术传统夯实基础;其二,就整个社会科学而言,返回到“社会学经典大师”所揭示的那些命题当中,把握社会科学逻辑的源头。正如康德所说:人类不止一次地将已经建好的“思维之塔”拆掉,看一看地基是否牢固。随着中国社会学重建与恢复20年来的努力,中国社会学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积累,这种学术积累究竟是停留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个案水平,仅仅告诉人们“世界是多样的”那种罗列,还是能够形成共同得到启示的“对话”(孙立平,编辑部编,1999)?在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中可共享和进一步切磋?其中最为基本的反思就是“返回古典理论”。它告诉我们,“重返古典理论”本身也是一个需要学者们长期不断思考的命题,同时也是参与建构人类“思维之塔”的学术建设过程。

1999年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虽然不能说“轰轰烈烈”,但继《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汪丁丁,1998)、《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与资本主义——韦伯的制度主义解释》(李强,1998)和“科层制与领袖民主——论M.韦伯的自由民主思想”(冯刚,1998)之后,论“抽象社会”(李猛,1999)和《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渠敬东,1999)等论文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渠敬东运用文献研究解析的方法,论证了在从形而上学向社会学的思想风格转变过程中,涂尔干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为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在社会的知识领域内的确立所作的贡献,以及他留给我们的关于现代性的两难课题。首先,作者论证了涂尔干对“失范”的论述的三重社会学意义,即它确立了从神性解放出来的社会生活的优先地位,在此基础上使个体获得了自我建构的开放性和可能性;然而由于涂尔干对常规化的知识形态和权力机制的强调又最终剥夺了个体的上述开放性和可能性。作者又通过对涂尔干关于“法人团体”之论述的考察,揭示出涂尔干力图阐述在逐渐多样化的社会生活中建构深度自我,从而使现代社会获得可能性的深刻用意。最后,作者通过对涂尔干及其追随者们对“类比和分类”的论述,向我们展示了涂尔干社会学理论所蕴含的一种意义深远的张力,即:社会控制功能与建构自我控制和调节作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主体化力量之间的张力。对涂尔干理论中“失范”、“法人团体”,以及“类比与分类”三个向度的解读,可视为作者对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所进行的一次“知识考古”式研究。作者的理论关怀是:在涂尔干理论给我们留下的有限的主体化可能性形式的基础上,能够勾勒出怎样的现代社会的理论图式,而这种新的理论图式是否能为崭新的社会存在形式提供理论依据。在这一点上,与更多地着眼于“未来”或“后现代”的当今众多西方的“现代社会”论者不同,李猛的论文发自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移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关怀。正是这一立足点促使作者着眼于现代社会的复杂的理性化过程中的制度与价值,意识形态及其二者之间的相关逻辑,引申了“抽象社会”这一批判性概念的分析性内涵。“抽象社会”的概念虽然最初见于70年代西方的文化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剖析,而李猛通过对西方世界的观念史与社会史的宏观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抽象社会的程序技术与价值理性之间有着“若即若离”的相关特性,即任何程序技术背后都存在不同抽象价值的冲突力量,另一方面抽象价值虽然构成了程序性的基础,但

它并非总是直接决定程序技术的运作,而是通过伦理实践,通过现代的“主体化”过程,间接影响程序技术运作的。作者提出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移植和渗透过程中,由于相关伦理实践的缺乏,导致现代社会的各种程序技术难以真正实现其程序化的特性,因而造成缺乏价值支撑和空壳式现代社会及表面经济繁荣的问题。

“重返古典主义”的研究对我们现代人的经验研究也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其一,对涂尔干社会学理论中所蕴含的社会控制功能与主体化力量之间张力的解析,是蕴含在古典社会理论中的关于“宏观与微观之链”(the macro-micro link)难题所进行的深入挖掘。然而,社会理论中的这一悬而未决的难题又是一切关于现代的社会理论所无法回避的古典课题。其二,对现代抽象社会程序技术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若即若离”的相关特性的论证是对社会变迁理论中的另一个古典课题的探讨,它所要克服的理论难题是:以往社会理论中的制度因素与观念因素之间的一元化还原主义。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理解现代的社会变迁机制提出更为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

(二)组织分析和单位组织研究

近年来,西方组织理论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发展动向。邱泽奇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系统地梳理了社会科学领域内组织研究的发展脉络,回顾并评述了以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的组织理论。通过对现代社会中迅速出现的网络化特征及其向社会组织领域内的渗透现象的描述,他进一步指出,面对网络化社会的到来,既往的组织理论不仅面临着严峻的困境和危机,同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邱泽奇,1999)。

周雪光在概述了70年代以来兴起的制度学派对组织与制度变迁的研究之后,采用文献评述的方法,对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进行了整理,概括了个案研究见长,理论假设明确的总体特征,并指出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理论解释与经验描述未能很好相嵌这一局限性。在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在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即重视市场与政治的关系,探索组织与制度变迁的机制,关注新兴制度形式(周雪光,1999)。围绕同样的问题,李培林从“拟市场核算体制”的企业运行机制角度,认为目前中国的单位组织是“一个企业两个法人”(李培林,编辑部编,1999)。可见,在围绕社会资源的问题上,“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逐步地被纳入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学者用它论证社团的发展有利于建立人际间的互信和互惠交换的规范之命题。有学者通过对中国广州市社团的调查,分析了当今中国社团亦官亦民的双重性,进一步提出了能够为社会提供上述有益的“社会资本”的社团发展的可能性和仍需要解决的问题(陈健民、丘海雄,1999)。秦晖针对目前国企改革难的状况提出了“依附与保障等量(捆绑式一体化)”的判断(秦晖,编辑部编,1999),其中我们可以领会到他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和国企职工的组织心态。李汉林、李路路在对中国独特的组织制度研究中,选择了合理主义的交换理论(布劳,1988)为理论框架,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资源交换的角度分析了当今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研究发现,在中国城市的单位体制中,存在着资源、满意度和依赖性之间的相关关系。作者借用关于统治(Weber,1970)和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下的国家统治的学说(布鲁斯,1989),阐述了在当今中国社会,单位组织仍然是国家实现其统治的重要中间环节这一论点(李汉林、李路路,1999)。这一研究的重要特点是将分析对象的主观层面纳入分析框架,试图突破组织结构仅用力量关系来说明的单一性。

另外,对新制度学派的讨论仍可见于今年的组织研究领域。如针对“嵌入性与关系合同”

的研究(刘世定, 1999)首先将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嵌入性”视角引向关系合同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提出了约前关系导入、多元关系属性、对关系属性的有限控制这三个补充假设,以完善威廉姆森的合同治理结构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合同治理结构和嵌入关系结构的不同对应关系及两者间的结构性摩擦。为了能够分析研究实践中更为复杂的合同关系的实施情况,作者更进一步提出经营代理人的“二次嵌入”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不确定性和相应的制度和组织发展的可能性。最后以中国的乡镇企业的关系合同为例,说明了经过发展和完善后的关系合同理论在现实问题研究中的应用意义。

总之,上述研究恰恰说明“工人、企业、资源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经济关系”(黄平编, 2000)。无论网络化社会,中国社会组织制度的特有形式(如单位体制和亦官亦民的社团组织等),还是当今中国组织制度的改革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新型组织形式与制度安排,都为组织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规范,这种经验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有望呈现活跃的学术趋势,进而推动组织理论的深入发展。

(三)关于社会网研究

社会网^①研究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的分支。社会网研究亦称社会网络分析,是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认识活动及其结果。它以视社会关系为相互交织的网络系统的认识为理论特征^②,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网络结构观以其动态认识之优势,弥补了地位结构观静态分析之不足,以其深刻性显示了更强的解释力。

社会学中关于社会网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 Simmel)在1908年发表的《社会学: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探讨》中提出的社会为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的观点(肖鸿, 1999)。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关于社区发展的研究中产生了社会网分析。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首次使用“社会网”概念。巴恩斯在其对挪威渔村阶级体系的研究中,首次提炼了社会网的系统研究。而至今被美国社会学界视为英国社会网研究范例的是英国学者伊丽莎白·鲍特(E. Bott)的著作《家庭与社会网》(肖鸿, 1999)。社会网分析在早期社会研究中,仅限于微网研究,即小群体内部结构和人际关系研究,而目前已发展到大规模的宏网研究,从而使社会网分析成为结构性与概念性较强的理论研究的得力工具,并使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钱江洪, 1991)。如美国的社会网研究从两种不同的分析路径发展,并形成了两类研究群体。一类是以林顿·弗里曼(L. Freeman)为代表,并以计量社会学传统为分析手段的研究。他们使用矩阵方法,分析了“社会系统内部系统和分解的模式,系统成员中‘结构上均衡’的角色关系,网络结构随时间的变迁和系统成员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方式”(Wellman and Berkowitz, 1988: 26)。研究一个社会体系中角色关系的综合结构即整体网络,其研究领域是小群体内部的关系。他们在分析人际互动和交换模式时,产生了一系列网络分析概念,如紧密性、中距性和中心性等(L. Freeman, 1979, 1980, 转引肖鸿, 1999)。另一类研究承袭了英国人类学家的社会网分析传统。他们关注个体间关系模式,从个体角度界定社会网,

① 社会网的概念:米切尔(J. C. Mitchell)将社会网界定为“一群特定的个人之间的一组独特的联系(Mitchell, 1969);亦指由个体间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张文宏、阮丹青, 1999)。社会网的概念,在今天已经超越了个人间关系的范畴,一个网络行动者可以是社团行动者如商业公司,甚至民族或国家。”关系既包括把行动者连接起来的联系(不限于个人间的关系),也包括商业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如领袖人物的共享、金钱、组织信息和群体成员的流动。今天的网络分析者把社会结构界定为网络的系统(Wellman and Berkowitz, 1988, 转引肖鸿, 1999)。
② 社会网的研究对象:社会网的结构及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模式是社会网的研究对象。网络分析强调研究网络结构性质的重要性,集中研究某一网络中的联系模式如何提供机会与限制,其分析以连结一个社会系统中各个交叉点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强调按照行为的结构限制而不是行动者的内在驱动来解释行为。

研究个体间的自我中心网络。他们关心的焦点是个体行为如何受其人际网络的影响；个体如何通过人际网络结合为社会团体，该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是马克·格拉诺维特(M. Granoveter)、哈里森·怀特(H. White)、林南(Lin Nan)和罗纳德·伯特(R. Burt)等(转引肖鸿, 1999)。

1. 几种代表性的社会网理论

(1)网络结构观：网络结构观就是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并认为：任何主体(人或组织)与其他主体的关系都会对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网络结构观不同于以往的地位结构观的主要特征在于，强调从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关系来认识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而非地位结构观将个体的社会位置归于个体的属性特征。因而，网络结构观对个体的研究，关心的是人们在社会网络中是否处于中心位置，占有网络资源的多寡、优劣及其摄取能力，分析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能动性、社会行为的“嵌入性”；而非地位结构观以个体属性特征认识人们的身份、归属感及社会地位(如阶级阶层地位、教育地位和职业地位等，肖鸿, 1999)。

(2)关系力量和“嵌入性”理论：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格拉诺维特首次提出了关系力量的概念，并将关系分为强和弱^①，认为强弱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和社会关系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虽然所有的弱关系不一定都能充当信息桥，但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定是弱关系。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判断，是格拉诺维特提出“弱关系力量”的核心依据(M. Granovetter, 1973, 1974, 1995)。他从四个维度^②测量关系的强弱，在研究市场经济中人们的就业过程时发现，他们在找工作时动用的个人网络更经常或更有效的是弱关系而非强关系(M. Granovetter, 1973, 转引张文宏, 1998)。这一概念的提出对社会网分析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K. Polanyi)早在50年代《大转变》一书中提出的嵌入性(embeddedness: 经济过程嵌入于社会关系的命题, K. Polanyi, 1957)有了一个很好的呼应。格拉诺维特于1985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M. Granovetter, 1985)的论文，进一步发挥了波拉尼的“嵌入性”思想，对经济行为如何嵌入于社会结构，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网络机制是信任；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信任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因而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M. Granovetter, 1985)。在嵌入性与强弱关系力量之间关系的问题上，肖鸿归纳说：嵌入性的概念隐含着强关系的重要性并与弱关系力量假设有矛盾。因为，嵌入性概念暗指经济交往发生于相识者之间，而不是完全陌生的人们中间。强调了信任的获得和巩固需要交易双方长期的接触、交流和共事；而弱关系力量假设强调的是信息不是信任(肖鸿, 1999)。

(3)社会资源理论：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在发展和修正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时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他认为，那些嵌入于个人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权力、财富和声望，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当行动者采取工

① 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弱关系则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因为群体内部相似性较高的个体所了解的事物、事件经常是相同的，所以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因其分布范围广，它比强关系更能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它资源。

② 1. 互动频率：互动的次数多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2. 感情力量：感情较强。3. 亲密程度：关系密切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4. 互惠交换：互惠交换多而广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M. Granovetter, 1973, 1974, 1995)。

具性行动时,如果弱关系的对象处于比行动者更高的地位,他所拥有的弱关系将比强关系给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为此,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的三大假设:①地位强度假设: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②弱关系强度假设: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通过弱关系摄取社会资源的几率越高;③社会资源效应假设: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Lin Nan, 1982, 1990)。

在早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社会网研究中,费孝通早在40年代便对中国社会结构中网络型之差序格局的特性有所涉及。他指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孝通, 1948: 365; 详见该文第一章第一节)。林耀华也曾指出这一网络型结构特性,说:“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新交往的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林耀华, 1944: 2)。早期的这些相关研究,其实所描述的即为如今社会网研究中的强关系现象(张其仔, 1999),并且是以人类学的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只是对这种现象做了描述,并没有进行深入论证(孙立平, 1996)。自8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包括国内学者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企业管理、农村基层经济生活及工业化等调查中,均发现了社会关系的作用与意义(张宛丽, 1996; 李路路, 1995; 彭庆恩, 1995; 郭于华, 1994; 桂勇, 1997; 李培林, 1996; 孙治本, 1995)。然而,这些研究都未展开对弱关系力量假设的检验,也没有对网络强度的差异效应展开研究,所以并不包含着与格拉诺维特弱关系力量假设的对话(张其仔, 1999)。

(4)强关系力量假设:从“弱关系力量”假设出发,对中国社会进行首次实证研究的是边燕杰对天津就业问题的研究。他以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官僚制为背景,检验了工作机会分配中的弱关系力量,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并提出了“强关系力量假设”(边燕杰, 1999; 转自张其仔, 1999)。边燕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官僚制下的工作分配体制中,个人网络主要用于获得分配决策人的信息和影响,而不是用来收集就业信息。因为,求职者即使获得了信息,但若没有关系强的决策人施加影响,也有可能得不到理想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能和主管分配的决策人建立直接的强关系,必须通过中间人建立关系,而中间人与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双方必然都是强关系。反之,如果中间人与双方的关系弱,中间人和最终帮助者未必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因此,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可以充当没有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网络桥梁(Bian, 1997a, 1997b, 转自肖鸿, 1999)。

2 进一步的验证及解释

张其仔利用其1998年在福建省晋江市西滨镇跃进村所做的社会关系的调查资料,检验弱网的力量对于就业之外的投资领域的实用性,以农民个人网络的方法进行探讨,发现了强网的强力,并对这种现象做出了不同于格拉诺维特“IS”模型的“IS-TS”模型解释(张其仔, 1999): (1)当信息分布与关系的强度不变时,网络的力量决定于信任与关系强度的关系。(2)不同的文化传统,关系的强度与信任的关系不同。信任程度高的社会,关系强度与信任的关系强度相对较弱。(3)信息过剩时,弱网的作用会增强。他强调指出,在强网与弱网的作用研究中,必须对其发生作用的文化与情景展开分析和梳理;并将其置于动态而不是绝对的位置上。不同的文化背景,其社会秩序的构成基础不同,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性的秩序构成基础问题。中国社会

秩序的构成基础不同于美国社会,它的基础在于强网,而不在于弱网(张其仔,1999)。在方法上如何处理动态的和文化的问题,我们拭目以待。

(四) 生命历程研究

有关生命历程(life course)的研究由于在方法和跨学科上的特性而构成了近年来实证和计量社会学派同时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该研究对象的主要特征是区别于生物学意义上躯体寿命、而特指人的社会生活的过程。由于生命历程被镶嵌于社会设置之中,被所处社会时间与空间所定义,所以生命历程的研究关注于这样几个维度:生命事件、生命跨度、生活史(李强、邓建伟、晓箏,1999:1),其中生活史和生命历程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运用基本相似。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该思想比较早地出现在《过渡仪礼》一书中。由于这一研究注重人在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中通过社会仪式(事件)反映出的角色、地位变化,来研究人作为社会人、文化人的成长过程,因此研究者明确地提出“社会是一个过程”(A. Van Gennep, 1909)的思想。这与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功能主义和把社会看成是“静态文本”的结构主义大不相同。这一思想对后来通过事件分析社会结构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中目睹这一动向^①。在中国,生命历程的研究目前已经被引用到了社会变迁、历史变动、口述史和事件—结构分析等领域(李强等,1999),但由于方法论上的要求,使得该研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积累,生命历程也只能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看到一些片断: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口述史”研究以及“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刘精明,1999)等,而这些研究都需要其自身的延续性。

尽管如此,生命历程的研究在方法与方法论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分析单位上,他们采用“同龄群体”(cohort)概念,这在生命历程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同龄群体的调查过程中,对一代人进行长期的、连续性的追踪调查,每隔一定时间对同样的群体进行调查,从中发现他们的生命轨迹,并通过被调查对象自身的变化(地位、角色等)来分析社会的发展轨迹。由于生命历程的研究一反形而上的时间概念,侧重“生活史”、“生命周期”,动态地把握时间、事件^②等变量,所以生命历程的研究是通过生活者的切身经历反证出来的一种轨迹。生命历程研究更加突出了一种纵向的社会分析,并且把人、事件和社会连接到一起来分析社会,它的历史也就体现在其中了。这种方法也因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研究者对人们社会生活中多重时间、事件变量及其复杂数据的技术性处理。它与以往的国内统计学方法不同的是,传统的计量社会学调查侧重于横向的比较研究,有关社会机制本身的分析则依赖于学术逻辑(方法背后隐含的理论)。生命历程的研究在解析社会的大骨架、减少以往那种植物人化和空洞无物的激昂口号、赋予技术性统计以灵魂,从而建立中国社会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桥梁的“中级理论”等方面都将起到推波助澜的学术作用。

(五) 社会学方法与方法论

对于社会学方法与方法论的探讨,仍然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会知识与经验世界间的关系:从第十四届世界社会学大会(14 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的主题及关注的问题中不难看出上述研究趋势^③。本届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著名

^① 如:Emmanuel Le Roy Ladurie 1975. *Montai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1324*.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② 如“结婚”、“生小孩”、“入党”等显示的那样,这里的所谓“事件”(events)并非仅仅是恶性的、事故性的事件,理论上首先应广义地理解这一概念,在具体的研究中它才拥有自身的狭义性。——笔者注

^③ 第十四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于1998年7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主题是“社会知识:渊源、挑战与展望”(Social Knowledge, Heritage, Challenges, Perspectives, 周长城,1999)。

的美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大会开幕式致词中指出:我们追求知识,知识的渊源究竟是什么?这种渊源有多长,又是如何建构的?正在以何种面貌出现?我们正视当前对知识渊源的挑战,这些挑战在过去20年中一直令人们生畏。挑战并不意味着抵触,挑战是一种对知识渊源提出的强有力的发问。我们将面临哪些挑战?哪些挑战将是我们预见的?我们能否将其与渊源紧密结合?或者说这些挑战会危及目前的学科基础吗?我们展望未来,然而问题不仅仅是哪些值得展望,而且如何展望?社会学是新型的智力创新和制度创新,社会学的边界和社会学的名称会维持将来50年不变吗?我们仅能通过评价社会学的渊源以及对这种渊源的挑战来探讨这些问题。加拿大法语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协会(ACSALF)主席达切斯特(Jules Duchastel)指出:我们的社会正处在全球化与分化并存的双向变革之中,此时的社会学也处在十字路口。假若这些转化在不同的社会显示出一些一般规律的话,那就是在不同的国家内部分化正在增长。社会学能否仍然作为知识统一体存在?社会学仍在社会运动和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吗?这些问题值得社会学家深思(周长城,1999)。

2. 继续审视社会学知识的社会功能:以全球化、国际化、信息化背景下的社会分化与智力创新对社会学的挑战为焦点,语言、知识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倍受关注。选择一种语言经常预先给定了研究的结果。语言知识能够帮助学者们开阔思路,接受其他的组织知识的方法(沃勒斯坦,1998;周长城,1999)。一种语言的转化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思想的传播,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洞察的那样。纵然有时研究过程试图解释普遍的结果与概念,但分析与研究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给定文化和知识渊源的一部分(周长城,1999)。

3. 进一步探讨社会学知识建构及其语言、知识与文化多样性间的关系。中国社会学研究存在着一种很大的张力,既要提高知识积累的规范性,处理好与西方社会学知识形态的关系,又要能够对中国社会现象做出独特的解释。西方文化历来重视知识生长、积累和知识谱系,中国学术界则总是企图回答最本质、最根本的问题,这与重视知识谱系的西方社会学的前沿距离就较大,这是个矛盾(孙立平,编辑部编,1999)。我们不应忽视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中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而当我们转眼学术“前沿”时,既不能将某一看似适合的概念或理论、方法简单照搬(刘世定,编辑部编,1999),又要注意在社会学知识谱系中的学术定位,讲究基本的学科方法的规范——自律(沈崇麟,编辑部编,1999)。如提出和证明、证伪了那些假设?如何证明?结论又是什么(李汉林,编辑部编,1999)?从而参与学术积累的人类知识工程。

二、社会热点问题研究

(一)环境社会学研究

80年代后期,环境问题迅速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中心议题。各方面都在关注地球环境恶化问题并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它是一门在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研究当代社会的环境问题及其影响的学科。关于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在西方一直有两种倾向,即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和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

1. 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特征是:(1)在研究主题上,它主要研究的是环境与社会的关系,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强调环境因素对于社会系统的影响。(2)在研究方法或分析框架上,主要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或分析框架,如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和系统科学的分析方法。(3)在研究取向上,主要是一种宏观取向,试图发展具有普适性的、关于理解环境与社会关系的一

般理论。(4)在与传统社会学的关系上,主要是一种对立和批判的关系。

2 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特征是:(1)在研究主题上,主要围绕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影响而开展研究,在这里,环境问题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析对象。(2)在研究方法或分析框架上,主要采用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社会学的一些分析方法或分析框架,如社会冲突分析和社会建构分析。(3)在研究取向上,主要是中观或微观取向,试图发展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关于理解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特殊理论。(4)在与传统社会学的关系上,主要是一种结合和利用的关系。

实际上,这种类型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不仅采用大量的社会学理论和概念,甚至也直接运用社会学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如统计调查和实地观察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类型的环境社会学更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色彩,更容易为主流社会学所接纳(洪大用,1999)。

中国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起步较晚,最早源于可持续发展研究,如人口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城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等,目前研究专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 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其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特点:(1)建立以现有统计资料数据为基础的评价体系,重点对发展结果进行评价。(2)对传统的GDP、GNP和NI等指标做重要修正,重新建立一些新指标。(3)重新建构新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以取代现行的GDP、GNP指标体系(国冬梅,1999)。

2 环境政策研究。有学者在分析影响中国环境因素的基础上,对中国现行的环境政策进行了分析:中国尚未从产业结构和生产工艺、从环境问题的源头、从防止环境问题产生这一角度来制定政策。这是中国环境政策中的一项主要失误。尽管迄今为止中国已颁布了13部独立的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并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套环境管理系统与法规体系。但这些主要体现的是强化的行政管理,缺乏有效的鼓励环境控制与治理技术开发的政策。另外,虽然从建制上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些环境保护和环境科学研究机构,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环境科学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学会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但中国公民的环保意识还不强,而且至今尚未建立起有助于强化公民环境意识的教育系统(徐嵩龄,1999)。

3 环境规划与环境管理。主要有关于环境规划的定义、作用与特征分析(傅国伟,1999),有以行政手段、经济手段这两种普通适用的常规管理方式为基础,分析中国环境管理现状及完善的对策研究等(赵勤,1998)。

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拥有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严格地说,从目前环境社会学的研究看,还没有自己独有的理论内核,它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其理论的发展水平可由社会学基本理论引入或移植到环境领域中来的程度所表示。对此,有研究者从环境社会学未来发展的角度认为:环境社会学未来发展的深层制约,既不在研究领域的宽窄,也不在于研究者持什么样的价值观,而在于确定适当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建设。至于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主题,研究者认为应当是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社会影响,其范式还是应当采取社会学的一些有益范式。对于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目标问题,研究者认为不应是包罗万象的、解释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宏观大理论。在现阶段追求这种目标,不仅不利于明确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而且环境社会学作为一门小的分支学科,也不可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其理论建设应当朝着默顿所提出的“中级

理论”方向努力。在某种意义上,环境社会学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其中级理论的建设情况(洪大用,1999)。

(二)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研究

多年来,中国的贫困问题研究主要是从绝对贫困的角度针对农村进行的。^①与农村贫困人口日趋下降的形势相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分配模式的变化和多种经济形式的形成与发展,社会成员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同群体间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且呈现出过快过猛的态势,使一些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下降,城镇贫困人口数量日趋上升。从许飞琼研究的数字显示^②看,中国农村和城市的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都有一定比例。就农村而言,两者比例在逐步缩小,而城市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两者都在扩大^③。尽管从数量上看,中国城镇贫困人口远低于农村贫困人口,但其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要远大于农村贫困人口。

沈红利用胡格韦尔特《发展社会学》的叙述框架,归纳了中国学者有关中国贫困研究的分析框架:第一,作为过程的贫困研究。包括贫困发生学和贫困类型学,讨论中国贫困何以发生、何以再生,贫困原因和机制。第二,作为互动的贫困研究。用一种或多种互动关系来看待贫困问题,包括区域差距、群体差距、利益结构分析、发展主体讨论。第三,作为行动的贫困研究。包括扶贫方式、传递系统、瞄准机制和参与式扶贫分析(沈红,2000)。综观近年来的研究重点,尽管对第一、二框架中的内容也有不少涉猎,但更多的是对第二框架中有关群体差距和利益结构分析的研究。

研究表明,影响贫困发生率有两个直接因素,一是经济增长,一是收入分配。经济学家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将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划分为3个阶段,其特征是:第一,1981—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初期,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收入分配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全体居民共同富裕、共享改革的成果。第二,1985—1989年,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导致居民的收入只有较低增长,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和发展,使收入分配状况发生急剧变化,表现为收入停滞,出现一定的两极分化倾向。第三,1990—1995年,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差距进一步拉大。基尼系数由80年代初的28.8增至38.8(魏众、B.古斯塔夫森,1998)。可见,中国城镇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与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相伴生。对于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有学者把它归结为发展因素、改革因素和政策因素,同时把收入分配的变化分为有序变化和无序变化(赵人伟、李实,1997)。而许欣欣则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的方法对影响城镇居民贫富差距变化的主要因素及其相对作用予以揭示。她指出:伴随着传统计划体制外从业者群体的成长,中国城镇居民中越来越多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从业人员降级为低收入群体成员——尽管二者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而一个地区的第三产业越发达,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外单位就职的人员越多,该地区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就越高。因此,所有制差异和地区差异是影响中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许欣欣,1999)。在对收入差距变动的一些经验分析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是财产收入差距问题。城市居民财产收入增长很快,

① 该研究作为一种政策性结果,1978—1998年,随着中国反贫困战略的实施,特别是1994年开始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使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42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4.6%(江泽民,1999)。

② 许飞琼根据相关年度的统计资料估算,1993年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发生率与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为9.4%与1.22%,城市这一比例为4%与0.46%;到1998年农村与城市同类指标分别为4.6%与1.06%、5.3%与0.87%。

③ 目前中国城镇有贫困人口1500—1800万,约占城镇人口的4.4%。

分布颇不均等。特别是自有住房估算租金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大幅度提高与近几年住房体制改革有很强的相关性。这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已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且影响作用会越来越强,很可能会与总体收入差距一起构成一对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的影响因素(李实、赵人伟、张平,1998)。

从目前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的基本走势看,虽然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但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收入差距可能持续扩大,贫困线会持续上升,从而导致更多的人沦入贫困阶层。从构成上看,失业、收入水平下降等城镇新贫困人口正呈强劲上升势头;妇女、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将成为贫困人口中最受关注的群体。另外,城乡间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也已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关于这种收入差距扩大的价值判断,学者们普遍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改革和矫正绝对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自然的结果,水没有落差就不会流动,收入拉开档次,社会就失去了必要的竞争机制。然而,中国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就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为超过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甚至超过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是值得忧虑的(许欣欣,1999;赵人伟、李实,1999)。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高度集中化已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强烈地(从物质和心理上)阻碍了公众对发展的参与,从而阻碍了健康的经济发展。从深层次上说,中国居民对收入分配方面的不满,实质是对机会不均等、对公共财富占有不平等的抱怨。因此,有学者提出:平等与社会公平问题应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许欣欣,1999)。

社会网研究也被应用在对城镇贫困家庭的研究中。有学者根据对上海市的个案调查分析指出:中国城市收入极其有限的贫困家庭,除正式的社会保障网络之外,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或社会互助也是贫困家庭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唐钧、朱耀垠、任振兴,1999)。有学者对中国城镇反贫困研究有所反思,并指出:近年来,城镇贫困问题日趋严重,业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相关的政策、措施也相继出台,但实施效果却不明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反贫困研究存在许多不足。1. 研究的滞后性。其研究多为针对具体问题的应急式研究,使理论与政策制订之间、政策制定与现实需要之间严重脱节。2. 学科的单一性。表现为研究内容单一,研究视角单一和研究层面单一。3. 贫困线的内涵不够清晰,贫困线的确定不够科学。4. 贫困者的确定研究比较薄弱。5. 反贫困原则的研究明显不足(王海玲,1999)。

(三)社会政策研究

围绕社会政策的研究,有关学者不断地寻找一条学术思想与政府行为之间的沟通渠道(戴建中,编辑部编,1999)。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始于80年代末期,时值今天,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凸显,有关研究和实践也受到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的重视,同时政策的实施则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

1. 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

有学者认为,目前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尚处于未成熟的阶段。按照马歇尔(T. H. Marshall)的说法,社会政策是指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透过提供服务或资金直接影响公民福利的行动,其核心包括:社会保险、公共援助、卫生福利服务和住房政策(熊跃根,1999)。还有学者认为,给社会政策定义的难点在于很难确定是否社会政策只关注社会(特别是经济)运行的失灵,亦或是总体上或逻辑意义上的社会福利,以及福利在多大程度上应作为国家的主要任务。事实上,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群体,甚至是同一国家、同一社会群体的不同时期,上述几方面都会有不同的解释。从广义上讲,社会政策研究的是国家与其公民福利之间的

关系,研究的问题包括一系列与社会甚至与国家有关的个人福利问题。所谓国家或社会福利,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于个人,而社会政策正是研究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把国家、社会的作用纳入到个人福利的组合中来。关于社会政策研究的特点,认为应该是理论研究的跨学科性、研究内容的区域性、研究对象及方法的实用性和研究手段的多样性(李秉勤,2000)的体现。

纵观目前社会政策理论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出,研究者大多致力于介绍国外较为成熟的社会政策研究成果,从而为中国开展社会政策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如向中国介绍西方学者因对社会政策概念理解的转变而建构一个社会政策概念的构架,它也被用来分析福利制度背后的理念、制度安排、政策实施及分配结果。对此,中国学者基于经济改革下中国的处境,探索了中国福利制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及社会程序(王卓祺、雅伦·获加,1998)。还有的研究以社会福利理念的三种主要思潮为线索,分析和解释了西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概念演变,通过国家、市场和福利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入探讨了它们各自的角色和功能,并以西方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为启示,反思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变化及未来走向(熊跃根,1999)。杨团重在阐明国际学术界研究社会政策的基本结构和主题(杨团,2000)。李秉勤在介绍社会政策的内涵及研究的特性、英国社会政策的研究和教学的基础上,还对在中国开展社会政策教学与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社会政策的教研实践提出了几点尝试性建议(李秉勤,2000)。

2 中国社会政策的经验研究

社会政策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阔,研究对象多为具体的社会问题,从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目前有关政策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1)住房制度改革。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确立了取消住房实物分配、实行货币分配的政策框架。另外,国务院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第一个配套法规《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以及一系列加快建设经济适用房的政策。这些政策从出台到实施,不仅有效地加大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步伐,而且使住房制度改革成为1999年最受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郭建波等人通过对中国住房政策的特点、问题的分析,指出了今后中国住房政策制定应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分为住房政策的基本原则、重点原则、可持续原则、综合性原则、效率与公平原则和地区性原则(郭建波、杨永增、刘小山,1999)。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提出诸多政策性建议:如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探讨取消福利分房与社会主义公平之间的关系;房改重大意义研究;房改与居民心态研究,房改与市民消费结构改革;房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等等。对于今后住房制度改革应注意的问题,有研究者指出要合理确定住房的补贴水平;要认真处理好企事业单位的房改问题;要确立市场价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合理比例;要解决好房改、房上市的问题;要加强房改纪律,防止房改中的不正之风(姜万荣,1999:197-199)。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是社会保险,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而其中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又是重中之重。从改革的成果看,成功地确立了统一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城镇职工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也在1999年正式启动;失业保险制度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日趋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创新开始进入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的新的发展阶段。目前,从制度创新的角度需要明确的问题主要有:基本养老计划为什么要选择部分积累作为筹资模式;在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如何划分社会统筹帐户与个人帐户的支付范围;谁来支付体制转换的过渡成本;如何确定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中企业与个人的缴费率;如何确定现行制度中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的分配比例;在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框架内给商业保险以正确定位;关于完善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改造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管理体制,真正实现行政管理机构与基金投资营运机构、执行机构与监控监督机构的分设;逐步放松对社会保险基金特别是养老基金投资营运的政府管制;为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实施确立一个恰当的政策框架;通过多种方式偿还中央政府的隐性年金债务;合理确定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加快社会保险制度的立法进程等等(中国社会保险制度课题组,1999)。

(四)妇女与性别研究

西方女性主义的社会学是60年代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学术成果之一。当时的社会运动揭示了存在于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的各种不平等和不公平,特别是民权运动自身也表现出的对女性参与者的排斥和歧视。它引发了一些女性主义社会学家重新审视许多对西方社会的基本假定,对社会机制与个人的复杂关系提出质疑,在社会学领域展开了妇女与性别的研究。简单概括这一过程,可以说经历了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的主要观点认为,由于传统学术对妇女的轻视和排斥,使得女性问题在学科领域消失了或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需要“寻找”和“发现”女性,这是一个“以妇女为中心”的学术研究阶段;随着研究课题和观点的多样化,学者越来越多地注意到社会性别的“关系性质”,强调在与男性的相对性中研究妇女(周颜玲,1989,1998)。

妇女/性别研究是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研究领域。女性主义的一个鲜明特色,在于它既是理论又是实践^①。“实践”的含义包括,在西方,这一研究领域的产生源于60年代的新妇女运动,同时不同的理论往往化作社会行动,直接推动社会变革。由于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向各个领域的不断渗透,以及随着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和主张的个人在各种国际机构中人数的增加,女性主义的成果通过交流、传播,尤其是发展项目和国际公约等影响到第三世界^②

“社会性别”概念,是近一两年在中国妇女研究界特别盛行的概念。有人认为,它是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它强调性别关系是一种社会构成,是表达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③。在西方社会科学以及以西方话语为主流的国际机构中,社会性别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分析范畴。这对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有研究者指出,在面对具体对象时,社会性别的分析范畴应与其他分析范畴同时使用,否则会推导出荒谬的结论(谭深,1998:97)。

无论怎样划分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事实是,来自国外的女性主义与在中国有几十年传统的妇女解放理论相互并存,都在对现实发生着作用,并且两者之间也在相互影响。最近,许平提出“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和“本土的女性主义”的概念,说的是不仅仅只有将西方女性主义的分析框架用于中国实践(即“本土化”)一种可能,同时还有形成中国本土女性主义的另一种可能(许平,1999)。由于涉及男性的女性主义思想,她的观点引起颇多争议。

换句话说,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本质上就是“中国社会研究”的一部分。因为任何概念

① 谭兢嫦、信春鹰主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第129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② 有关妇女与发展的理论和发展项目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李小云等,1999)。

③ 谭兢嫦、信春鹰主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第145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工具的出现都与其所在社会的逻辑分不开^①。西方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崛起,正是发现个人权利中并不包括女性,所谓“平等”的理念实际上掩盖了性别间的不平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西方女性主义看起来是对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全面审视和颠覆,但是并没有脱离其基本的哲学理念(王政,1995)。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和进程与西方早期情况相去甚远。妇女在其中的位置也是另外的情况。就1949年以后的工业化与妇女关系来说,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50年代开始的国家工业化。由于其“内部积累”的模式将农村排除在外,但城市工业的扩张又需要劳动力,加上当时的社会主义“平等”的意识形态,城市妇女被大量吸纳进工业组织,但不是作为廉价劳动力。国家工业化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公私领域的分离,相反在单位制的组织形态下二者相互渗透,这造成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独特个性。安德鲁·沃德(Andrew Walder)从企业与工人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工人对企业的“制度化依赖”。平萍通过调查女工的生活经验指出,沃德的研究模式是“不见性别”的,女工的依赖结构与男工全面地依赖企业不同,是双向的,既依赖企业,又依赖亲属。这与企业的性别策略相关,同时也是女工自己的建构(平萍,1998)。

第二种特指改革后农村的工业化。颇具中国特色的“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其社区倾向及以血缘关系为特色的社区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妇女的就业是有保护作用的。而女性就业之所以不与男性冲突,原因之一是农村的“户平等”逻辑。这种逻辑认为男女都是分属于每一户的,所以户的平等也就是男女平等。但是这种“户平等”并不排除户内的性别等级制(笑冬,1999)。金一虹的同类研究也揭示出,当进入工厂、实现“非农”转移仍属稀缺资源时,社区采取了按户分配名额的做法。而家庭利益分配的原则,当地人只承认有一个,即“先长后幼”。但是调查却发现,实际的分配是先男后女,先长后幼,先内后外。其中某种“潜原则”,就是根据与父系制的亲缘疏密来区分的(金一虹,1998)。

第三种特指工业化与妇女关系的研究。它主要出现在改革后的沿海外资企业中。由于外资所在地的发展程度以及企业类型不同,所以女工的待遇差别很大。但是它们的一致之处在于,大量使用本地以外的年轻女性^②。外来资本与外来劳动力的这种结合方式,典型地显现了全球化经济的特点。原来在主权国家内政府、劳方和资方的“三方结构”出现重组,优势明显向资本一方倾斜,这是世界劳工领域普遍遇到的难题(谭深,1997)。

无论赞成改革开放的社会学者抑或消极对抗者,面对这种发生在身边的“世界经济体系”、“依附理论”、“全球化”或“现代性”等社会现象提出了许多亟待研究和值得中国社会学家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潘毅,1999;谭深,1997,1998)。要之,在市场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妇女问题的热点是一个资源、地位变化、参与发展的可能性的研究。它在理论上的难点则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如何与“社会性别”对话的问题(刘伯红,编辑部编,1999)。然而在学术思想界妇女研究似乎被孤立化,同时它也面临着两大障碍:其一是意识形态化(政治话语),其二是面对西方知识的那种民族心理障碍(李银河,编辑部编,1999)。

(五)NGO 的研究

-
- ① 比如关于工业化与妇女的关系,一般认为,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是以剥削女性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它引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男性工人对女工的排斥。同时,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是公私领域的分离和个人本位的价值观。
- ② 因为她们是“廉价劳动力中的廉价劳动力”,这是目前新兴劳资关系在性别上的反映。由此可见,在那些处于创业阶段的工厂中,出现了类似早期资本主义的“血汗工资制”和“青春压榨”。其背后的逻辑是,女性只在婚前工作,因而可以充分利用她们精力最充沛的阶段。

有关上述“亦官亦民的社团组织”的研究,在中国当属围绕 NGO(非政府组织: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的研究。中国伴随体制改革出现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是:原有的国家二次分配体系中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由于财力不足而趋于萎缩,二次分配系统内也出现了不平衡,取而代之的则是方兴未艾的民间公益事业。它使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围绕财富的宏大交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按劳取酬以及富裕阶层的出现给民间社会提供了经济基础。目前在中国 NGO 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以下三方面:其一是具有全球化色彩的环保组织。他们对因盲目工业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有一种批评精神,反对以人为本,反对单方面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其二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主义色彩的社会关怀的组织(如希望工程或传统的民间公益事业)。这种组织在当今中国又可划分为两种,即国家体系内的二、三级社会团体(如全国青联、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等^①)和民间组织(如民间自生自长的民间互助团体)。其三是针对具备一定“市民社会”倾向的俱乐部、新兴宗教团体和因特网社会^②的研究。

自 1991 年国家经贸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IETEC)举办的第一届 NGOs 国际研讨会到 1999 年由中国青年发展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共同举办的“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发展和中国希望工程国际研讨会”,中国 NGO 组织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两个具体的研究领域:其一是新型社会组织的机制与既定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包括社会资源、利益格局的研究);其二是社会传播与大众文化领域。有研究表明,由于中国的社会组织直接与其社会制度相关,所以,它的 NGO 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纯粹的 NGO 组织,首先它要有“挂靠单位”,其次不能有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活动。于是,中国的 NGO 的特点集中地表现在如兴办教育、医疗卫生、植树造林、帮助老弱病残等具有社会关怀色彩的福利和援助方面(罗红光,1993),其意义就在于非营利的组织活动。国外对中国 NGOs 的评价是“亦官亦民”,或“小政府大社会”。事实上 NGO 组织或多或少地具备跨国籍、跨文化的特征,它也拥有宏大的理念,并以此来作为他们行动的理论背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 NGO 在中国尚属启蒙阶段,但围绕 NGO 成员所必备的奉献、义务精神等方面的研究同样将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围绕 NGO 成员的奉献、义务进行讨论的学术焦点在于:有酬和无酬劳动的社会价值问题^③。在古典经济学研究中,只有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才被称为“社会劳动”(马克思,1972 [1898]:171—172)。NGOs 的社会活动所创造的价值并非单一的商品价值,其中有人和组织的存在价值,这一价值被当事人的生活理念、道德情操和人生观所支持(郑也夫,1999:75—82),所以,围绕财富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社会运动,消费同样具备“社会劳动”的属性。传统上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是财富的社会运动的一个方面,随着信息与流通的发达,生活方式对商品生产结构的影响也同样至关重要(黄平,2000)。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民间组织成员的付出(奉献与义务:消费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是通过交换来塑造一种价值体系(罗红光,2000:132—134)。然而,“剥削与被剥削”的所谓“不平等”交换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贬义特征使它很难被广泛地、公正地运用于现实中如家庭义务、民间公益事业、慈善机构、社会福利、公共事务等诸多义务关系领域,同时它也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社会主

① 据 1998 年统计,中国像这样的机构已经超过了 20 万。

② 因特网社会在中国一出现就表现出极大的发展势头。它与世俗社团不同,与其说它不受世俗社会等级、人际关系的约束,毋宁说它在资源的共享,克服世俗社会中的代际、性别、宗教、国籍等障碍方面,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在娱乐和社会批评等方面的共识,它反过来又给网民的世俗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③ 其中包括人的生活情趣、理念、国家的公共职能、人道主义的讨论。

义国家公共职能的一般性讨论。民间公益事业的研究表明：围绕财富的劳动与消费是具有人格的(罗红光, 2000: 2; 134), 正因为 NGO 成员的付出构成了 NGO 的基本资源, 所以集团性消费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文化建构也就成了 NGO 活动的一大特征。进而它也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类新问题: 在围绕涉及社会基本结构的阶级阶层分析中, 发达国家已经逐步地以支配财富的消费情趣(能够反映主观意志的集团性消费活动)来定义阶层, 承认阶层等级的文化属性。而中国的学者仍习惯采用占有财富(埋没个性的商品)量来物化阶层含义, 或者无视马克思当时分析社会结构的脉络, 将代表社会分工的职业与阶级阶层直接划等号^①。这种学术距离并非因为中国人没有消费情趣或生活理念, 如在把握 NGO 性质上透出某种游移不定的倾向(沈原, 1999: 2)那样, 而是由于研究不同于体制的社会组织的制度性心理障碍所致。因此, 目前在中国围绕 NGOs 研究的特点并不在于社会组织本身, 更不在于中国有没有“市民社会”这种本末倒置的讨论, 而在于事实上它已经承担了本来属于国家二次分配体系应当承担的诸多公共义务, 并在减少国家二次分配过程中的管理成本以及通过该交换渠道所实现的付出方式的意识形态化等方面。

目前 NGO 研究所面临的应用问题除了研究如何提高被援助方的“造血功能”和生活质量以外, 如何理解“异文化”也成为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援助方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 面临的最大困难并不是些技术上的问题, 也不是仅仅谈论全球化的人道主义精神便能解决的问题, 而是因为 NGO 活动同时将面临“草根文化”、“跨文化”和“人道主义”这三个层次上的不同社会制度、社会语言、宗教信仰的现实问题, 他们要面对地方性知识的挑战, 这实际上是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交涉。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研究和引导民间公益事业, 这对国家与社会间的协调发展有着积极作用(杨团, 编辑部编, 1999)。在这个意义上, 研究 NGOs 实际上也是探索跨国籍、跨文化的协作关系和相互理解的一项课题。

三、结 语

综上所述, 在过去一年里, 社会学研究领域似乎并无重大的学术事件或抢眼的热点问题, 新的话题似乎也不多。然而贴近来看则不难发现, 已有的研究角度和相关课题大都逐渐深入和有所推进, 一些长期性的研究显露出学术价值, 呈现出深度与广度上的开掘态势。一种更为平实与沉稳的研究心态和研究风格渐成趋势。对于这样一种总体趋势, 可以表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社会理论研究领域中, 以重返古典主义为口号的对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经典问题和经典理论的回顾、重温与反思, 成为 1999 年的重要话题。在这个新潮理论和时髦话语日渐繁多、你来我往的时代, 社会学应当面对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应当回答的中国社会的根本现实问题却往往被遮蔽。于是, 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概念接着一个新的概念, 一个新的范式跟着一个新的范式, 而一些“基本问题”却在这种对时髦的追逐中迷失。因而, 返回古典主义, 返回到“社会学经典大师们”所探讨和揭示的那些基本问题和理论化解方案, 一方面将有助于我们把握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和渊源, 为学术的薪火相传和发展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来更有力度的把握我们面临的当今时代的问题, 如现代性的问题。应当说, 社会学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 其问题意识亦应经常回到起点和基础, 即确立自身经典性的

^① 这种短路的做法是因为有关学者并没有真正地分析社会结构、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和社会意识而造成的。

命题,方能对经验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意义发挥指导作用。

(二)逐渐建立起比较规范的学科视角和学术视角,是过去数年比较明显的一种努力,也是1999年中国社会学的一个明显进步。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一直存在一种很不利于学术进步的倾向,即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人为的分野。搞理论研究的与搞经验研究的,成为人们公认的专业分工。理论工作者似乎并不太关心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而实证研究者从事的大量社会调查也常常无从体现社会学的学科背景,缺少学科取向和理论关怀。然而在近年来,这种人为的割裂正在出现一种融合的趋势。原来偏重理论的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现实问题与经验材料,甚至开始从事深入的经验研究;而在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开始体现出学术关怀和理论追求。从本刊一年来刊载的专题研究和诸多研究论文来看,大而无边、妄下断言的论文已经极为少见,而以具体、深入的叙述与分析见长、同时观照重大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的佳作则明显增加^①。我们固然不敢断言这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已蔚为大观,但至少朝向这一目标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三)在研究方法上,更为注重总结提高和追求方法的准确精当。在过去20年间,中国社会学深受美国社会学研究风格的影响,占据主流位置的是大规模问卷调查和追求精确的定量分析。从过去一年的时间看,这种研究风格仍然是中国社会学的潮流,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正在朝着更为科学、规范的方向发展,在建立大规模的数据库、问卷设计、抽样技术、统计分析等方面,专业化的程度不断提高,有质量的成果也在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在理论上明显受到欧洲人文主义倾向影响的研究方式或称风格也在初露端倪,这种研究风格以个案性的、细致深入的访谈材料为基础,以深描和理解性的分析为叙述方式,强调对于中国社会生活中那些至为重要但又非常微妙的机制和现象的研究。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则更为强调对于“过程事件”的理解和对意义的追寻,同时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样的一种努力开始于几年之前,但在1999年已经表现出一种更为明确和系统的努力,并开始的相关的研究领域产生初步的影响。在1999年夏季由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调查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方法与发现”国际讨论会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讨论会上,有关这种研究风格的方法论论文和经验研究论文(孙立平,1999;应星、晋军,1999;孙立平、郭于华,1999;马明洁、孙立平,1999),均受到广泛的关注。可以预见,这样的一种研究风格,可能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四)在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与对话方面,学术共同体的意识明显增强。作为一个恢复和成长过程中的年轻学科,如何确立自己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位置,如何在对本社会实质性问题的研究与跨越国界的学科发展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和摸索的问题。在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之初,明显存在自说自话、与国际学术界缺乏沟通和交流的倾向。进入90年代之后,努力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开始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但在这个时候,也明显存在着为对话而对话的倾向,每做一项研究便套用某种西方理论来验证或挑战,结果只能导致一种生硬的和浅薄的形式对话,并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同时由于不能形成自己的基本问题,使一些研究显得支离破碎和缺少连续性。而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

^① 参见本刊《论抽象社会》(1999,第1期);《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1999,第2期);《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1999,第5期);《“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1999,第6期)等论文。

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表现为把立足点建立在对研究对象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关注国际学术界的最新进展,恪守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的规范,从而对研究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实质的交流与对话。

(五)在围绕研究实践、方法与理论之间关系的讨论中,虽然学术争鸣、讨论不够热烈,但已初见成效。这集中地反映在本刊“学术争鸣”和“社会学笔谈”这两个栏目中。从1998到1999年期间,本刊特设上述栏目,为的是开展学术争鸣与反思活动。如在“学术争鸣”栏目中,围绕阶级阶层的分层标准问题(米加宁、李强,1998;No.1,111—115)展开了讨论;与刘书鹤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商榷(唐晓群,1998;No.2,101—103);有关“九五”末期失业率的计算方法问题的修正意见(冯兰瑞,1998;No.4,124—125);另外,在“社会学笔谈”的栏目中,有许多关心社会学发展的同仁也提出了诚恳的意见(谢遐龄、风笑天、叶南客,1999;No.2,119—125);这些讨论涉及对社会学理论、问题意识、社会学方法,或者直截了当地涉及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等等。我们认为,讨论的焦点基本上仍局限在经验与方法的层面上,针对理论缺乏建设性的推敲。有许多问题实际上已被社会学家们发现,但未能做认真的解释分析(谢遐玲,1999;No.2)。在社会学中,方法被理论(或一种假设)所支持,形成了具有针对性的方法论。但是,理论是否被经验研究证实或者证伪,这一涉及社会学基础理论的学术意识往往被社会现象的罗列和平面描述所冲淡。研究不是在经验的层面上徘徊,就是用统计学的办法来表达其理论的代表性。从现象上来看,我们的证实远远多于证伪,这又意味着什么?只有“改造这个世界”的人的理念——永恒的实践目的是正确的吗?我们的所谓范式(人为的思辨能力)不能在经验研究的过程中矫正吗?有关非营利组织、生命历程和市民社会(包括因特网)的研究向我们证明所谓的人类发展也是在反思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运动。我们的研究并非单纯地为了方法而论,方法论上的规范并不应当成为研究思路上的桎梏、僵化思维的枷锁,而应当是提高实现经验和理论之间沟通的一种桥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学术争鸣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一个浅显的现象而又基本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学界长期困扰着我们——对“社会问题”与“社会学真问题”混淆不清。为了实现理论与研究实践的真正“对话”,同时也为了证明我们的所谓社会学理论是否具备指导社会实践的能力,我们诚挚地希望学术同仁能够参与争鸣与笔谈,同时也欢迎从事具体社会工作的同志针对学者们的研究提出经验层面的宝贵意见。

在千年之交综观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历程,其探索的艰辛、进步的曲折和发展的希望都是有目共睹的。而由于各种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原因,其薄弱之处也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知识整理的缺少、知识积累的不足,对理论脉络和已有研究的梳理、综述和反思不够,良性的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未能真正建立起来。由此有延续性和生成性的问题意识便无从形成,有潜力的研究也就无法深入。无纵深感,无递进性,必然导致在学术上没有发展的增长,这是制约学术进步的大障碍。

参考文献:

W. 布鲁斯,1989,《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和政治体制》,华夏出版社。

彼得·布劳,1988《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

编辑部编,1999,“'99中国社会学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发言记录,北京:12月23日。

陈健民、丘海雄,1999,《社团、社会资本与政经发展》,《社会学研究》第4期。

风笑天、田凯,1998《近十年我国社会学实地研究评析》,《社会学研究》第2期。

- 傅国伟, 1999,《当代环境规划的定义、作用与特征分析》,《中国环境科学》第1期。
- 郭建波、杨永增、刘小山, 1999,《中国住房政策的特点、问题及选择》,《中国房地产报》1月1日。
- 国冬梅, 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进展》,《上海环境科学》第1期。
- 洪大用, 1999,《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 黄平编, 2000,《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浙江人民出版社。
- 江泽民, 1999,《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动员起来夺取八七扶贫攻坚战阶段的胜利》,《长江日报》7月21日。
- 姜万荣, 1999,《1998~1999年:中国住房建设与住房制度改革》,载汝信、陆学艺、单天伦主编《199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金一虹, 1998,《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李秉勤, 2000,《英国社会政策的研究、教学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待发表。
- 李汉林、李路路, 1999,《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李猛, 1999,《论抽象社会》,《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李强等, 1999,《生命的历程——重大社会事件与中国人的生活轨迹》,浙江人民出版社。
- 李强、邓建伟、晓箬, 1999,《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李实、赵人伟、张平, 1998,《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经济研究》第4期。
- 李小云等, 1999,《性别与发展理论述评》,《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刘精明, 1999,《“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刘世定, 1999,《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社会学研究》第4期。
- 罗红光, 1993,《中国のNGO》,《中国年鉴 1993年:中国の环境问题》1(别册),大修馆书店。
- , 2000,《不等价交换:围绕财富的劳动与消费》,浙江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1972,《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 马明洁、孙立平, 1999,《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讨论会论文。
- 潘毅, 1999,《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平萍, 1998,《国有企业的性别策略与女工的企业依赖》,《社会学研究》第1期。
- 邱泽奇, 1999,《在工厂化和网络化的背后》,《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渠敬东, 1999,《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沈红, 2000,《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评述》,《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沈原, 1999,《“制度的形同质异”与社会团体的发育——以中国青基会及其对外交往活动为例》,中国青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行。
- 孙立平, 1999,《“过程事件”分析与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洞察》,“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讨论会论文。
- 孙立平、郭于华, 1999,《“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讨论会论文。
- 谭深, 1997,《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与外资企业及当地社会的关系》(未刊稿)。
- 谭深等, 1998,《理论篇:问题与讨论》,金一虹等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
- 唐钧、朱耀垠、任振兴, 1999,《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学研究》第5期。
- 王海玲, 1999,《中国城镇反贫困研究的不足》,《当代学术信息》第1期。
- 王政, 1995,《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性运动》(第一章),当代中国出版社。
- 王卓祺、雅伦·获加, 1998,《西方社会政策概念转变及对中国福利制度发展的启示》,《社会学研究》第5期。
- 魏众、B·古斯塔夫森, 1998,《中国转型时期的贫困变动分析》,《经济研究》第11期。
- 肖鸿, 1999,《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笑冬, 1999,《一个基本的看法:妇女与农村工业化》,《社会学研究》第5期。

- 熊跃根, 1999,《论国家、市场与福利之间的关系: 西方社会政策理念发展及其反思》,《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徐嵩龄, 1999,《中国环境政策分析与建议》,《科技日报》3月27日。
- 许飞琼,《中国贫困问题的基本规律分析》(待发表)。
- 许平, 1999,《一个中国男人土生土长的女性主义观点》,美国“中国妇女研究的未来”会议论文。
- 许欣欣, 1999,《中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演变趋势》,《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杨团, 2000,《社会政策的理论与方法》(待发表)。
- 应星、晋军, 1999,《集体上访中的“问题化”过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讨论会论文。
- 张其仔, 1999,《社会网与基层经济生活——晋江市西滨镇跃进村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赵勤, 1998,《中国环境管理模式的总体评价及前瞻》,《中国环境科学》第5期。
- 赵人伟、李实, 1997,《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经济研究》第1期。
- , 1999,《中国居民的收入变化分析》,《中国改革报》5月5日。
- 郑也夫, 1999,《人的本性: 生物学的启示》,《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周长城, 1999,《社会知识: 渊源、挑战与展望》(记第十四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国外社会科学》第2期。
- 周雪光, 1999,《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周颜玲, 1989,《社会学中国化与妇女社会学》(复印件)。
- , 1998,《有关妇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 A. ファン・ヘネツプ, 1977,《通过仪礼》,绫部恒雄等译,东京: 弘文堂 (by A. Van Gennep, *Les rites de passage*, Emile Nouny, 1909)。
- Bian Yanjie, 1997a,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 , 1997b, “Getting a Job through a Web of Guanxi”. Chapter 5 in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edited by Barry Wellman, Westview.
-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 , 1974,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85,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edited by Petter V. Marsden and Nan Lin. Sage Publications.
- , 1995, *Getting a Job* (Seco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n Na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edited by Petter V. Marsden and Nan Lin. Sage Publications.
- , 1990, “Social Resources and Social Mobility: A Structure Theory of Status Attainment”,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247–271, editor by Ronald Breig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 ウェーバー (M. Weber), 1970,《支配の社会学》,创文社。

责任编辑: 吴哲